

第一辑
哲学与文化问题

“人文精神”的东方视点

—

又是一个世纪末的来临！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价值观陷入深深的危机。中国的社会看不到曙光，而所有既定传统的价值观似乎都是阻挠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为了摆脱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变者，天下之公理”的具体内涵也便转化成为向西方人学习的实践行为。

令人深思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文学科的惟西学是从，紧跟着西方人的后边来演绎和图解中国社会生活，远不比任何时候逊色。尤其是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导致的诸多价值失范，更促使不少学人跟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后边，来“拆解”和“解构”中国的“话语”，仿佛这样一改进，中国文化便和世界文化接轨了。而实质上，这不过是把中国人的生活当做西方理论的普遍性的注脚而已。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深深地忧虑，中国文化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边跑龙套要跟到几时呢？

二

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可以以度量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称之为“学科”（Subject）而不是“科学”（Science）。它通常是指哲学、伦理学、艺术、宗教等等。

人文学科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整体展示，亦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人格的积极塑造的具体体现。时下有诸多学者甚为热烈呼吁的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更进一步，“怎样关注人文精神”便必然转化为人文学科的建设问题。如若连怎样建设我们的人文学科的立足点问题都缺乏深刻的自觉意识，那么，“人文精神”云云，便成了一句空话。

所谓提高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人文学科建设的意识，即是说，我们要来个视点的彻底转变，以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本体，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象，来吸收和改造他民族的文化成果，真正建设充满中国灵魂和传统的人文学科。

提出这样的论题，看起来极具保守气息。我们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学等等，何时不把民族化和本土化问题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再说，现代文化学研究也表明，任何一民族接受他民族的文化影响总是在既定的传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其实，从现象上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和以本民族的文化传

统为本体来积极地建设它，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就自然科学来说，它的移植过程以其共通性、普遍性、可检验性进行跨国界跨文化的传递。以自然科学的这种移植和传递方式来对待人文学科，就患了简单化的毛病，后者和各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密不可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亦属常识的问题一直未引起国人、尤其是当今青年学子的普遍关注。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日益深入，这样以移植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移植人文学科的做法愈演愈烈。几千年的中国人文学科的丰富内涵惟有拿西方人的“金钥匙”才能打开；《老子》、《庄子》格言的丰富内涵，惟有西人发明的“拆解”才能泄密。《十三经》的笺释方式被轻而易举地改制成为“经书语式”，于是乎，一部又一部洋洋大观的中西合璧的“话语”巨制便给予中国文化传统以新鲜的血液。西方流行新感觉主义，强调叙述策略的客观化，中国便有被炒得火爆的新写实主义与之凑趣。西方有所谓新写实主义的“新浪潮”，中国的影坛巨星们便跟着附会西方人的口味，以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西方的绘画当今流行政治波普，中国的先锋圣杰便跟着制作文化大革命的招贴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我个人的鉴赏趣味，有不少此类作品，其体现的聪明睿智，令人击掌。但由此形成一种文化态势，并且大有不如此就是落后的和不够进步的意思却令人堪忧。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辈学人再不深入思考，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建立中国人文学科，使之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历史地位，积极参与现代本土精神的塑造，而一味附会西

方人，将有愧于我们跨世纪的行程。

当然，所谓的“应该如何……”云云，总是一种可能性。但有这种意识和没有这种意识所导致的历史行程是截然不同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总体上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西学的基座来梳理和规范中国学术的历史走向，较少以“中学”为基座来透视当代的即时性的文化与现象。

三

对形成上述人文学科研究“定式”的反省，有利于调整我们的思想意识，认清时下人文学科盲从于西学的历史根源。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的战火硝烟的弥漫中被迫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起初，中国的贤士们天真地以为，以西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叙》）便可击败西人的侵略行径。因此，最先译西人之书，“兵学几居其半”（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可结果仍然吃败仗。在深刻的教训面前，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便由具体的工艺学的模仿扩展为科学技术理论学习，并贯彻到教育中去。应该说，从着眼点上的确深化了，可结果还是躲不掉挨打的命运。历史似乎逼着中国人更进一步：全盘西化。这具体体现为两方面的社会行为，一是试图从政治体制上仿造西方人的三权分立，建立民主政体；二是从思维方式上来改造中国人的艺术化的思维

趋向。政治上的西化很快证明行不通，而思维方式上的西化几乎从未被怀疑过。这便是五四时期所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面大旗。无可否认，它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基础的奠定，对以科学化的方式全面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在全新的基础上塑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种高扬“赛先生”对人文学科本土特点的忽视，完全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人文学科的建设，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严复便是最先试图以西方的严格的逻辑归纳和演绎来对中国哲学进行改造，如《名学浅说》便提出以今之化学的概念来界定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气”。胡适《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大纲》（上）更是以西方人的哲学框架来排比中国哲学的史料。甚至连中国的第一部语法著作——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也是着眼于中国语言缺少科学原则，而试图提供一套可以以简驭繁的普遍规律。金岳霖的《知识论》公然倡明，他是演绎逻辑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歧义混乱的弊病。以西学为基座来整理国故，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成了这一时期人文学科建设的“范式”。梁启超有感于此，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今日非西学不兴为患，而国学将亡之为患。”梁氏的感叹并非说没有人研究国学，而在于国学成了西学的具体例证。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便是这种对待人文学科的态度在人生观问题上的体现。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认为，科学给予人们提供多种自然规律，指出达到幸福和经济的必由之路，

由此，科学当然可以支配人生观。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勱诸人为代表的“玄学派”，则认为这是以欧洲为中心论的翻版；这恰好表明西方人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忽视。张君勱指出，人生观有五个特点：主观、直观、综合、自由意志、单一性，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所无能为力的。很显然，“玄学派”是想把科学问题和人生问题分为二物，以为人文学科摆脱自然科学特征的束缚来张本。

今天看来，玄学派的主张在当时条件下的确不利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利于对封建余毒的消除，不利于科学思想深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对中国这个特好“往回看”的民族来说，不“矫枉过正”便很难使新的思想传播，更不用说触动悠久的传统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派”的人生观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拥有新思想的人的社会假定：西方的物质文明与其精神文化价值是等值的，其物质文明高于我们，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价值也高于我们。长久以来，除社会政治等敏感的问题之外，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上几乎绝少有人怀疑这一点。即使偶尔有一点异响（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也被整个社会潮流淹没了。

但是，由此我们也不应菲薄这一段以西学为基座的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经过近百年的观点的根本移位，我们为在全新的基础上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人文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通过这段以西学为基座的对中国人文学科的梳理，对西学有了深入一步的了解，积累了人文学科建设的丰富的经验，获得了本土文化重建的参照点；2、由于是以西学

为基座，因而着重于暴露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消极面，由此培植起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整体机能的丰厚的营养；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人文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将日益促使这一发展契机的深化，而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接轨，也为中国人文精神的世界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必然要付诸人文学科建设的具体行动。

四

怎样行动呢？就目前来说，最为迫切的是提高对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的自觉意识，并把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的根本基点确立下来。

汤因比曾说：“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们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方。”“将来统一世界的人”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

汤因比并不是妄自菲薄欧洲文化，而是他对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洲在精神文化上的彻底失望。主观、虚无、形式主义，追求翻新效应——列维·斯特劳斯说，这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征兆”。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学家，总是给予西方文化的坚实的精神价值的建构，而每一次的努力，都表明了

渐趋东方化的浓厚的色彩。·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隐喻的生命归依意义的论述，和中国《易经》的“简易”、“变易”、“不易”的整体性甚为相近；而他的学生伽达默尔把他的整个解释学理论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又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和”、“群”的追求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德里达的所谓“拆解”或云“解构”、“踪迹”、“涂抹”，简直可以用老子的“道”来代替。可我们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总是让西人来唱主角，中国人来插科打诨。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西方人就会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来改造自己，相反，他们依然是站在自身文化传统的立场来拯救当今西方文化精神的危机。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契机”呢？希腊文化溶进了他们的血液，希伯来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目前还是他们主流文化同化的亚文化。惟有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统一 21 世纪的期待，或许即缘于此。哈佛大学著名文化家塞缪·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下个世纪将是西洋文化，传统儒教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不再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冲突。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文化学家詹明信近年来一再申述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崛起对现代国际文化的发展的根本意义。如此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解体，对西方文化的优越地位失去信心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对东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世界精神的关注。

其实，对我们来说，转变一下立场，重新调整我们的思

想基座，即可看到另一番面貌。对此，李约瑟便是极好的代表，他的诸多论点便是力求站在中国人文精神的立场上，以中国文化为本体，来透视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他说：“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西方人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社会性的事业的优越性，夸大成为一种文化的优越性”。因为西方人的人格是分裂的，逻辑化、原子化，造成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而中国人的人格是一元的，强调永恒的运动性，统一性。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人道主义将对现代社会的科技文化产生深远的意义。“全世界依靠中国文化传统得救。”^[2]李约瑟如是预言。

我们也改变一下视角，又该会如何呢？

比如，我们论本体论问题，必由希腊始，说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如此详尽地讨论了共相和个别的关系。虽然未解决，但却深化了人们的认识，而老子的《道德经》却说：可“道”非“道”，“道”而不可“道”。就今天来看，谁的回答更精彩呢？站在西方人的原子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是柏氏，而站在生存论的立场上便是老子。再进一步，我们把这种生存论的“可道”与“不可道”的关系置于现代社会来探究它的意义与价值，是不是可以构成中国人文学科西移的内涵呢？

注：

[1] 《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4-295页。

[2] 《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第112页。

迎接 21 世纪 ——中国文化世纪的挑战

—

21 世纪迫在眉睫。

说那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带有极大的冒险性。但是，当这种极富冒险性的预言被众人一再议论之时，尽然是预言，也极有“三人成虎”的趋势。对这种说法，最使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诸如“东方之路”、“东方浪潮”；“中国经济的腾飞将迎来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但当我们完全凭借西方人的这种“东方主义”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的未来之时，那就令人不无遗憾地说：那只能是“期待中的东方主义”。理由之一是：他们是站在他们文化的需要上来割舍东方精神，以供他们的文化发展之需。理由之二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进行这种东方

主义文化之路的探索，比如油画语言的学习和创造以表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且以这种古典语言的写实和造型技能为范例，来对中国画进行现代转换；再比如史学和国学的研究的所谓现代化，也是以西方人的理论为基础来填充中国历史的具体材料。诸如此类，都导致一个共同的文化理论之结果：西方精神的普遍性加上中国人的历史的社会的例证。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谬误：简单地把文化精神的移植等同于科学技术的引进。这儿有一个事实层次和文化价值层次的区分问题。应用科学方法是无国界的，这仅是在事实层次上而言，至于文化价值层次就不能如此简单化。正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别，由此谬误而造成这样的吸取西方文化的导向：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优秀的、先进的，远远高于中国，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价值也一定是先进的、优秀的，远远高于中国，于是这种把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混为一体的双重输入使我们忘记了其间的根本性差别。

举一个例子便可明白：引进一套高尖端技术设备和这一学科的领尖人物，立刻便可带动这一学科在国际上的优先地位。可中国引进十个毕加索，也丝毫无助于中国艺术的世界化，因为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精神文化的价值正在于特定民族对共同现象的独立价值表述形式，而科学技术的传递特征之一在于消除掉任何地域性的普遍性。

由此引出如下的结论：精神文化价值的民族特征没有先进与优劣之分，而科学技术以及通过对人的教育而使人掌握科学技术的方式是有优劣与先进与否的差异。二者有内在的

联系，但不等于可以消融成为一个等值的问题。

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说，20 世纪以来的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破坏性批判，不能当成是中国文化低劣的证明，而只是一种态度的转变；而态度转变的社会基础便在于社会物质基础的深刻变迁。这个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的文化与现实的结论正是我下边要提出的“21 世纪——中国文化世纪”的起点。

二

作为一名中国人，说 21 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

我想，对这个问题应该先从西方当代文化的发展来透视，才具有说服力。

进入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的程度，达到了一百多年前人们甚至连梦想也不曾达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发展似乎却是在“挣扎”中寻找着价值的基点。萨特的“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命题，既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人的自由性，也一同把个人的盲目性和孤独性展示无余。海德格尔的人生在世的 *sein* 和 *Dasein* 的永恒的流动和转化，似乎把人的有限的生命嵌进了历史运行的必然行程，但又难以与宿命论划清界线。新一代的结构主义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和巴尔特，把语言学引进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直截了当地宣称“人死亡了”，“人被结

构消解了”。最为令人感到深刻而又震惊的是：拉康把语言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所建立的心理结构模型和福柯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文化的静态结构模型对个人消除为非个人的剖析，禁不住让人有彻底绝望的感觉；人在这个结构中太渺小了。

我绝不是因此在否定上述诸多西方巨哲的文化成就。不可否认，他们在许多方面深化了人类对文化现象和人类的社会文化行为的认识，把文化的结构功能和个人的行为关系、文化的静态化和动态化的转化过程、文化的深层基质等等方面剖析得比以前要深刻而又有趣得多。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观念还原为他们所置身的时代语境的现实感受之时，却不得不说；西方文化的确让人感到走进了死胡同。尤其是自 70 年代以来升温起来的后结构主义的“拆解”、“解构”、“非中心”、“非结构化”的文化价值的游戏式的“破坏”，更让人感到临近穷途末路了——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耄耋之年的列维·斯特劳斯说的。

于是，西方人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以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核心的华夏文明。这是因为希伯莱文化已成了西方文化的骨骼，古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化的血肉，埃及的、意大利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英格兰的地域文化综合成了西方文化的神经中枢，他们已把这诸种文化功能的效力发挥到了最巅峰状态。惟有东方古老文明的中国文化，他们还未认真地补过课。

据此，我认为，关注东方文化，从中国文化涉取养分来重塑欧洲文化，是欧洲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尤其是在

东方诸多国家迅速跃上发达行列之际，深切地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将是其迫切的现实课题。汤因比早在 70 年代就预言，下个世纪的世界文化主流将东移，那时候选择这一文化主流的承负者的最大可能的候选国是中国。李约瑟从中国文化所塑造的国际主义的宽容精神的角度，认为在竞争和民族自觉的热潮中，惟有中国文化的此类精神能拯救人类。

我在本文开始时说，文化与现实的物质基础既有内在联系，又是两个层面的非等值的关系。梁漱溟早在 1921 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就一再申诉，物质文明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创造优秀的文化。他的目的显然是在为中国文化张本，告诫人们在输入西方物质文明之时不要忘记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呼声随即便被强烈的西化热潮淹没了。

之所以如此，那便在于以物质文明为前导的精神文化的优劣往往是以物质成果的最后较量来裁定的。当中国人还沉迷在先王圣贤的遗泽中梦想太平盛世之时，而西方人却为了财富到处殖民，最终以他们的“船坚炮利”宣告了西方文化的胜利。于是，作为中国文化精神集中体现的“内圣外王”的“虚己”“慎独”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致圣之路，全都成了西方人睥睨中国人的笑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一百年前，这些胜利者的先圣们还在顶礼膜拜中国文化的这一优秀成果。比如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莱布尼兹，甚至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普鲁士大帝腓特烈。莱布尼兹是多么地为中国文化在教化人的一己之欲的功能力量惊叹

不已！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看法的根本性的转变的呢？那便是文化所体现的这一社会期待功能：当一个民族以无比强大的整体面貌展示在另一个民族面前之时，这个民族诉诸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优点；而当它以愚昧、落后、守旧的整体面貌展示于另一民族面前，它诉诸另一民族的便是它的文化的缺点。这正是 18 世纪时的中国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的文化地位 180 度转变的基本原因。不仅西方人这样看，20 世纪初期的大多数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如此看，比如法国人类学家赖朋（Gustavo Le Bon）写于 1916 年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不仅一再说中国的落后和中国社会体制有关，并进而归之于中国这一人种所决定的思维特点，而译者张公表对此却极为赞赏，认为他翻译此书也正是为从思维上改造中国人起到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类论调，不论从自然科学的意义、还是从文化价值的取向上，都是十分荒谬的。

但是，中国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向西方科技文化教育的全面学习中，经过近 40 年的经济建设的摸索，终于从 80 年代开始找到了建设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适合于现代情境和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仅仅在短短的 15 年的时间里，便提前五年完成了 2000 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工业结构和城镇人口结构发生了趋向于现代化社会的整体结构的转移。85-95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的减弱势头。从近代工业革命开始，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从 1649 年到 1932

年共延续了 183 年。第二个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从 1776 年到 1865 年共花了 89 年时间。而于拿破伦时代（1789—1815）进入这一行列的 13 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 73 年。在 20 世纪开头 25 年进入这一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平均却只花了 29 年。^[1]根据人类社会的这种承继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经验表明，当一个民族在学习另一个民族的先进经济之时要比其开创者的摸索过程短得多，甚至一两代人的努力便可创造其开创者近千年才能达到的成就。^[2]因缘于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文化学家预测：中国按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下个世纪的 20 年代便可跃居世界最强国家的行列。

于是，那对中国文化睥睨的态度开始向赞赏和重新省思方面转化。这个惟一从上古五大文明古国延续至今的国家的崛起，它的深厚的文化源泉，必将会产生不同于近代以来的任何国度的文化外溢的价值特点。大概正因此，有的欧洲人不无恐慌地提出，要及早寻找对付中国世纪来临的对策。从这一方面说，中国文化的流溢是其深厚源远的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的内在趋向，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其主观意志逆转它。

三

那么，中国文化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的国际文化中心东移的过程中，为人们所关注并被人类给予最高期待值的是什么呢？